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20世纪初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既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和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青年为寻求救国真理，开始大批有组织地赴国外进行勤工俭学，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场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缘起于1912年2月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他们之所以鼓励国内学子赴法留学，除了留学法国每年费用“较赴日本留学所费无多”之外，同时也希望通过留学法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表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留法教育因袁世凯的破坏趋于停顿，李石曾、蔡元培等便流亡法国继续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在一战爆发后来法的华工中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创办华工学校，选拔一些较有知识的华工，授以普通知识和中法文，学成后赴各工厂充任译员，并在业余时间教授其他华工。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中法两国的文化沟通和交流，1916年6月22日中法两国人士又在巴黎共同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宣布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道，尤重以法国科学之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为欧乐，中方会长为蔡元培。此后，华法教育会便成为这场特殊的留法教育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1916年6月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华法教育会中方领导人和会员蔡元培、李石曾等相继归国，把推动留法教育的工作重新搬回到国内。1917年5月，他们首先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随后又在直隶、山东、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和陕西

等地成立分会，“推广留学”“劝导学生留法”。同时，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各类介绍文章，大力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意义。他们之所以提倡留学法国，除了留学法国费用低廉、法人对于他国人“亲和而无畛域”外，更多是因为法国是欧洲近代文化的先驱，近代法国教育多有适宜中国之处。比如，法国教育不受“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的束缚，这一教育观念最适宜于中国。而且法国科学发达值得借鉴——“泰西诸国各有专长，而发明斯理之毅力，与各类学问之博通，均以法人最为著”。

在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同时受五四新文化“工读主义”“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1920年迎来高潮。从1919年3月17日首批89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至1920年12月15日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前往法国，前后共有20批中国留学生集体前往法国，加上一些自行零星分散前往法国留学的学生，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总人数接近2000人，蔚为壮观，接纳赴法勤工俭学的学校共有30所，接纳勤工俭学生做工的工厂则多达60余家，“几乎布满了法国全境”。

法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支持

赴法勤工俭学作为一场留学运动，虽由中方组织发起，但若没有接待法国国的合作和支持，是难以持续的。事实上，自1912年俭学会成立之始，就得到法方友好人士的支持。

北洋政府外交顾问法国人铎尔孟，曾为留法俭学会创办的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义务讲授法文，“教法至善，进步甚速”。1916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中法文化交流总机关华法教育会，实际上也由法方人士的倡议而设

20世纪初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 葛夫平



1920年春假，在法国蒙达纪学习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合影

立，3月29日在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上到会 and 报名的法方人士就多达32人，他们中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员、前政府教育文化官员、议员、音乐家和医学博士，多为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学教授欧乐被大会推举为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议员穆岱为副会长，法国中学教师贝纳和法国农科实业学校教务长法露为书记，共和工商会代表宜士为会计。在后来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法方人士具体负责与法国有关学校和工厂的联系工作。不但如此，在中国国内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分会也多有一些法国人士参与，如法国领事官魏武达出任上海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担任评议员，中法实业银行行行李雍担任会计，法国特派驻华管理华工委员荣苏理任干事。法国友好人士的支持，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期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中法两国邦交的升温 and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开展，该运动开始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18年11月，法国政府特使格里耶起草了一份有关扩大法国和法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的行动

计划，建议法国政府资助华法教育会在华创办法语学校，对那些希望来法留学的中国青年进行法语培训；在北京设立中法中学和中法大学，并成立一个管理中心，促使中国政府在一些省级教育机构开设法语课；在北京创办一份法文周刊，以便有兴趣接受法国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中国人能及时了解法国的思潮；中法两国共同负责录用中国工人，法国为这些工人组织法语教育。这份计划，后来大多得到落实。稍后，在法国驻华公使包朴的多次建议下，法国政府还于1920年10月正式在外交部内专门增设“中国留法学生监督”，加强与勤工俭学生的联系和管理。法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在政府官方层面也大力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1920年迎来高潮。

即便是在法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法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支持。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生因法国出现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之后，法国政府也伸出援手，于1921年初成立“中国留法青年协会”，向数百名没有生活来源的中国学生每天发放6法郎救济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自1922年秋季开始，法

国政府又改变资助政策，设立奖学金用以资助已进入高等学校的勤工俭学生，并改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负责此项工作。由法国外交部和协济会设立的奖学金名额最多时—年达26个，金额则依学生所学专业 and 所在地区的不同有很大区别，最高者每年可获得6000至7100法郎，最低者—年仅为500至750法郎。据统计，在1922—1928年的7年里，获得资助的中国学生共有100人，金额总计为375528.32法郎。

总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曾获得法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和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就此来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桩名副其实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在中法两国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影响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首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建党史上留下重要一页。受一战以及一战结束后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反思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先驱，诸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等。1921年初，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已经在巴黎成立。据统计，1921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人，留法生中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5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8.6%。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留法的党员达到210人左右，占全国党员总数20%多。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就充分肯定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作用，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及经济建设培养了各类有用人才。据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统计，截至1923年1月10日，中国学生在法国高等院校就读的计有225人，中等学校计255人，专业涉及法律系、医学系、理工系、文学系、药系等，法国各著名大学几乎都有中国勤工俭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后来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勤工俭学生近40人。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留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留学模式，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至20世纪初也有些有志青年自费到国外留学，尤其以自费留日多为多。但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到国外留学只是有钱人的事，需要家境殷实，方能为之，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则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开创了通过勤工进行留学的新模式，为那些家境条件不好的有志青年前往国外留学提供了新的渠道。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与沟通方面亦产生深远影响，起到重要桥梁作用。—方面，一大批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在学习和工作中，通过与当地人的交往带去中国文化，增进法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另—方面，勤工俭学生亦是向中国传播法国文化的使者，诚如赴法勤工俭学生在—份声明中所说：勤工俭学的宗旨是来研究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希望将来回东方之后，改进中国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们是中法友谊的建筑师，在工厂里，与工人共生活，在田庄里，与农人相往来，能说能谈，能沟通劳动社会。在学校里，与教员、学生交接，致知格物，能沟通知识阶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塞尔维亚汉学家普西奇：中塞文化交流的使者

海外汉学家

徐冬皓 张西平



普西奇创办的塞尔维亚汉学杂志《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期刊》封面

拉多萨夫·普西奇（Radosav Pušić），是塞尔维亚第二代汉学家、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和孔子学院院长，普西奇专注于汉语教学、汉学研究 and 翻译工作，在中国、美国、英国 and 塞尔维亚本国 have 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并写有多本著作，对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读《道德经》开启探索中国哲学之路

普西奇在塞尔维亚的学校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他对历史、文学 and 哲学等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课堂上展现出非凡的才华。16岁的时候，他读了一本由德文翻译成塞尔维亚语的《道德经》，由此开启他探索中国哲学之路。尽管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提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教育资源，但他的求知欲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促使他自发地开始寻找关于中国的信息和书籍。

1981年，普西奇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并选修了汉语课。尽管当时有27名学生学习汉语，但到了三年级，他成为唯一坚持学习汉语的学生。这个经历展现了普西奇对汉语学习的执着 and 毅力。在1985年至1988年期间，普西奇前往中国深造，先后在

北京语言学院 and 南京大学学习。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度过了一年时间，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随后，他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两年，专攻中国古代哲学，涉及南北朝史学、古代哲学、禅宗等领域。这段留学经历使普西奇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and 认识。

普西奇留学归国后，先后担任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外国语学院 of 汉语老师以及哲学院的古代哲学课程老师。与此同时，他还相继攻读硕士 and 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系列的学习 and 教学经历，不仅丰富了普西奇的学术知识，也增强了他对汉学研究的热情 and 动力。尽管面临着语言 and 文化的巨大障碍，但普西奇的决心 and 毅力使他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汉语并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and 哲学。这段经历加深了普西奇对中国文化的渴望 and 追求，也为他日后在汉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普西奇正式开启了他的学术之路，作为讲师正式入职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他在继续教授汉语课程的同时，还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工作。2006年，因为在塞尔维亚汉学界的突出学术成就 and 较强影响力，普西奇当选为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以及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的首席执行官。

涉猎中国哲学、艺术、历史等多个汉学研究领域

普西奇的汉学研究以其丰富多样的主题 and 深入的探索而著称，涉及中国哲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并且他善于用简洁的文字概括复杂的历史事件 and 思想流派。

在普西奇看来，中国哲学是全世界最有价值 and 最伟大的宝库之一，通过翻译 and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以促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天子：中国古代哲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道德经》等多部中国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普西奇是第一位将《道德经》从古代汉语直接翻译成塞尔维亚语的汉学家，由于直接从中文翻译，普西奇能够更准确地传达《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 and 文化内涵。他对中文的理解 and 汉语的熟练运用，使得他的翻译更能捕捉到原著中蕴含的深刻哲理，更贴近原著的原始风貌，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领会其中的思想。在谈及他翻译的《道德经》跟以往从英文到塞尔维亚语的译本相比有何特点时，普西奇说：“首先，我是从中文翻译成塞尔维亚文的，这就是它与其他翻译的不同之处。与某人交谈时用对方的语言 and 通过口译交谈并非—回事。其次，如果说我的生活 and 我对世界的看法、对哲学的理解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那些不同或者说特色恰好反映在我的翻译中。”

在专著《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普西奇介绍了禅宗的起源，以及道、气、存在、自我等重要 的禅宗概念，探讨了禅宗对于心灵静默、直觉体验、超越言语的领悟等方面的理解。同时，普西奇进一步探讨了禅宗哲学与中国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他提到禅宗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在艺术创作中，这意味着艺术家追求表现自然之美，而非简单的模仿。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变化、感受大自然的气息，艺术家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自然界的生动 and 神韵。比如，—幅山水画

可能不只是描绘山川河流的形态，更应传达出艺术家对自然的感悟 and 体验。禅宗还鼓励个人发挥创造力，并追求内心的自由。在艺术创作中，这意味着艺术家不受传统规则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这种自由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独特的笔法、个性化的构图，也可以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突破。通过对禅宗与艺术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普西奇揭示了禅宗对于中国艺术美学的重要影响，以及艺术作品中蕴含的禅意 and 禅境。

在专著《火凤凰——中国文明史纲要》中，普西奇以特殊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通过石头、井、米、茶以及水与龙、火与凤、图腾与萨满等中国元素，逐步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演变 and 丰富多彩的内涵。比如，对于中国“龙”形象的诠释，他不只是进行简单的传统解读，而是通过历史、神话 and 文化的综合分析，在呈现龙的神秘之美的基础上，从历史、艺术、文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展示了龙对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 and 文化情感的塑造。该书从这些文化符号、概念 and 事物延伸出—系列揭示中华文明基础的主题，包括中华文明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质朴的阴阳辩证学说，把中华文明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本主义精神、认知世界的图像都编织在—起，超越时空，焕发着智慧的绚丽光彩。

为塞尔维亚民众提供诸多了解中国的机会

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他致力于推广中国语言 and 文化，并促进中塞文化交流。在普西奇的领导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汉语教学 and 中国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通过举办学术讲座 and 文化交流活动，普西奇为塞尔维亚民众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加深了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and 认识。

早在2012年，普西奇就作过“中国传统健身运动：气功与太极”的讲座，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中华文化中

注重身心平衡的理念。在其“公共外交与中国经济增长”讲座中，普西奇向学生和嘉宾介绍了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深入探讨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 and 影响。普西奇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其多边贸易活动、对外投资、技术革新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贡献，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谈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塞尔维亚的影响时，普西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为塞尔维亚及周边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和基建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和社会稳定。通过详实的案例 and 分析，普西奇为听众呈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及其与塞尔维亚的合作潜力。

2009年，普西奇创办了塞尔维亚第一份也是唯一—份汉学杂志——《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期刊》，开辟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塞尔维亚”“中国作家文萃”等文化交流栏目，并于2016年被塞尔维亚教育部科学评审委员会列为核心期刊。这本期刊的目录 and 编者的话以中文、英文 and 塞尔维亚文3种文字出版，是巴尔干半岛唯—本涉及中国文化并以3种文字出版的期刊，是普西奇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之—。2016年，获悉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普西奇和孔子学院提前做了精心准备，特地为习近平主席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用中、英、塞3种文字出版的《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期刊》—套，并由塞总统府赠与习近平主席。这份礼物不仅代表着普西奇 and 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 and 友好，也展示了塞尔维亚与中国在文化 and 学术交流方面的深厚基础。通过这本期刊，普西奇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正如该刊编者寄语所写：孔子学院发行期刊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声音，把塞尔维亚 and 周边地区热爱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人们联系起来，并积极地参与进来，为增进塞尔维亚对中国 and 世界的了解做出自己的努力。